

# 寧夏固原出土的外國金銀幣考述

羅 豐

寧夏固原博物館

〔內容提要〕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南郊發掘的隋唐墓中，共出土五枚外國金銀幣，一枚屬薩珊卑路斯（Peroz）朝銀幣，一枚屬薩珊阿爾達希爾三世（Ardashir III）金幣的仿製品，其餘三枚是東羅馬拜占廷金幣的仿製品。本文通過對這五枚金銀幣的考察、分析和測試，並結合國內其他北朝至隋唐墓葬中出土、有明確紀年的外國金銀幣，做一通盤性討論，希望能對北朝至隋唐時期途經原州的「絲綢之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進而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南郊發掘的隋唐墓中共出土五枚外國金銀幣，有墓誌顯示這是一處中亞史國人後裔的墓地，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固原南郊墓葬群有明確紀年的墓葬中除去梁元珍墓外，另外五座史姓墓葬中均出有外國金銀幣。史道德基金幣是含在墓主人口中，其餘四座墓的金銀幣均出土於棺床可能是墓主人上肢的部位，雖然這些墓葬均遭受盜掘，但是可以肯定金銀幣的位置大體上沒有被移動，因為盜墓者如發現這樣貴重的金銀幣一定會被帶走，它們原處的位置應當不被注意，如含於死者口中或握於死者手中這些隱蔽部位。這五枚外國金銀幣經過初步研究，有一枚屬薩珊卑路斯（Peroz）朝銀幣，一枚屬於薩珊阿爾達希爾三世（Ardashir III）金幣的仿製品，阿爾達希爾三世金幣或銀幣及其仿製品在中國境內均沒有出土，屬首次發現，具有特別重要的含義。其餘三枚則基本可以確定是東羅馬拜占廷金幣的仿製品。為了使人們對於北朝至隋唐時期途經原州的「絲綢之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特地將一九八一年冬固原東郊雷祖廟村北魏漆棺畫墓出土的另一枚薩珊卑路斯銀幣〔註一〕，一并納入本文進行討論。

## 一、薩珊卑路斯銀幣

(一)北魏漆棺墓銀幣一枚，直徑為二點七厘米，重三點五克。

銀幣外輪廓不甚規則，正面有一周聯珠紋邊框，中為薩珊王側面肖像，王冠下部有一周聯珠紋邊飾，中部與後部有城齒 (neylon) 裝飾物，前部有一新月，冠頂上有一又翼狀物翹起，再上有一新月，新月托一圓球。肖像前部自下而上有半周銘文。從王冠形制及飾物來看，可以肯定這是薩珊朝卑路斯 (Peros 四五九至四八四年) 銀幣。銘文是用古波斯帕勒維文 (Pahlavi) 另一譯作鉢羅婆文) 寫成，但多已模糊不清。這是一種草體文字，辨認起來非常困難，所以一般的辨釋後都採用拉丁文轉寫，參照摩根 (J. de Morgan) 的《東方古錢幣手冊》可以知道完整的銘文轉寫是「KADI PIRUCI MLKA」，一般可譯作「主上，卑路斯，王。」【註二】背面亦有一周聯珠紋邊框，中央為拜火教祭壇。祭壇下部為兩級台座，台上為一圓柱，柱中繫有一緞帶，緞帶兩邊下垂，祭壇上燃有火焰，火焰由小圓點組成三角狀，可以看出火焰右側有一新月，左側為一五角星。祭壇兩面站著兩個面相對的祭司，祭司作拱手狀，右側祭司背後有一行帕勒維文銘文「𐬀𐬎𐬎」，應當是鑄幣地點的縮寫，轉寫為拉丁文是「AB」，其全稱是阿巴爾沙爾 (Abarsahr)，是薩珊東部呼羅珊省所轄的四府之一，今地為Nisapur，依照馮承鈞先生的考訂，即《西使記》中的納商城，《元史》中的乃沙不耳、你沙不兒等，在今伊朗東北境之尼沙普爾【註三】，這一地名起源於Ner-stapur (公正的沙普爾王)。但是在帕勒維文中「AB」這一縮寫與另一縮寫「𐬀𐬎𐬎」非常容易相混，而後者的轉寫則為「SR」，其全稱為西雅埃牙恩 (Sriayan)，屬於薩珊中部的基爾曼省所轄。左側祭司後一般是鑄造年代，雖有字母，但多數已模糊不清，已不大容易辨認。

(二)隋代史射勿墓銀幣一枚，這座墓的確切紀年為隋大業五年 (公元六〇九年)，直徑二點七厘米，重三點二克。

銀幣正面為一聯珠紋邊框，框中為薩珊王肖像，肖像呈側面，中部與後部有城齒狀物，前部有一新月，冠頂上有一雙翼狀飾物，再上為新月，新月托一圓球，與前述卑路斯銀幣完全一致，銘文內容不可完全辨認，應該和前述銀幣一樣。銀幣邊有兩個穿孔。背面聯珠紋邊框中是拜火教祭壇，壇座有兩級，中間為圓柱，柱中央繫有下垂緞帶，柱上仍有兩級，其上燃燒

著火焰，火焰呈三角形，火焰兩側爲五星和新月，一般所看到的是新月在右而五角星在左，如北魏漆棺墓中的那枚，而這枚卻是新月左，五角星在右，在已經發現的薩珊卑路斯銀幣中屬於少見。祭壇有兩個祭司，拱手相對而立。右側祭司背後是帕勒維銘文「𐎧𐎡𐎴」，這一名稱是何鑄造地的縮寫，目前很難斷定，只能有以下幾種推測。首先，很可能是「𐎧𐎡𐎴」這一縮寫地點的減寫或異寫，這一縮寫一般轉寫爲「S」，也就是「SM」，該地點的縮寫在薩珊錢幣的研究中屬於不可以確認確切地點的縮寫，那怕是大致的確定目前也尚不可以達到；第二種可能，則應是某個有「C」這種字母地點的減寫，帕勒維文中有一字母，但不經常出現，一般摻雜在其他字母中使用，不大單獨運用。如在「MRWV」這個縮寫地點中就曾出現，該地點被確認是Merv，這一地名的古名稱Muru亦作Maru，即《後漢書·安息傳》中的木鹿城，《隋書》中的穆國，《新唐書》中的木鹿，《元史》中的麻里兀，即原前蘇聯的馬里城〔註四〕；第三種可能，是另外沒有見到過的縮寫，薩珊錢幣造地很多，現在知道的大約有二百多處，目前可以基本確認的地點約有四十四個縮寫，共包括四十二個地點，另外大約仍有五十個左右的常見地點的縮寫被認爲是不可以確定的〔註五〕。左邊祭司後僅有個別字母可以看清，但正巧有一穿孔打過，其鑄造年代不可知。

這枚銀幣從兩側的穿孔來看，顯然不是實用流通貨幣，當系墓主人生前飾物，發現時在墓主頭部，可能是含在口中的。北魏漆棺墓中的那枚，卻沒有穿孔，可能用於寶藏。

附表一：波斯薩珊朝卑路斯銀幣在中國發現地點統計表

出土地點	出土時間	埋葬時間	數量	型式	資料來源	備註
洛陽北邙山唐墓三〇	一九五五年	七世紀	二枚	A式一枚 B式一枚	夏鼐《考古學論集》一二八頁	
西寧市內城城隍廟	一九五六年	約五世紀	七六枚	A式一六枚 B式六一枚	同上	
西安張家坡隋墓四一〇	一九五七年	約六世紀	一枚	A式	同上二七頁	
西安隋李靜訓墓	一九五七年	六〇八年	一枚	B式	《唐長安城郊隋唐墓》一九頁	
廣東英德南齊墓八	一九六四年	四九七年	三枚		《考古》一九六一年三期	

河北定縣北魏塔墓	一九六四年	四八一年	三七枚	A式三一枚 B式六枚	《考古》一九六六年五期	
陝西耀縣寺坪隋舍利塔墓	一九七〇年	六〇四年	一枚	B式	《考古》一九七四年二期 《考古學報》一九七四年二期	蓋於左 眼上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 一一五號墓	一九七三年	約七世紀初	一枚	B式	《考古》一九七四年二期	
湖北安陸吳王妃墓	一九七九年	約七世紀初	一五枚	不詳	《文物》一九八五年二期	
寧夏固原西郊北魏墓	一九八一年	四八八年左右	一枚	B式	《文物》一九八五年五期	
甘肅省天水市	一九八三年	不詳	一枚	A式	《內蒙古金融》一九八七年七期	征集
廣東曲江南華東M三墓	一九八四年	約公元五世紀	九枚殘一枚 可綴合	不詳	《考古》一九八三年七期	
廣東燧溪近灣村窖藏	一九八四年	約公元五、六世紀	十二枚	A式一枚	《考古》一九八六年三期	
甘肅張掖大佛寺	一九七〇年	明正統年間 公元十五世紀	五枚	B式十二枚	《甘肅金融》一九九〇年增刊	
洛陽郊區窖藏	一九九一年	約五世紀末*	二〇〇餘枚	不詳	《新疆金融》一九九一年增刊	

※洛陽郊區出土的二〇〇餘枚薩珊銀幣，詳細的報告沒有發表，僅在個別文章中有所涉及，據稱其中有庫思老（Kasrau）一世、二世銀幣，但由於所附照片十分模糊，不能看出其屬庫思老銀幣，另外一文附較清晰的拓片中只有卑路斯銀幣，這批銀幣很可能均屬卑路斯一個時代的銀幣，由於某種偶然急變的原因被主人埋藏起來，其埋藏年代或距卑路斯朝不長。

據以上不完全統計，目前在中國境內發現薩珊卑路斯銀幣共約近四百枚。

薩珊朝諸王每位一般只鑄有一式銀幣，但也有少數國王鑄有一以上的式樣，卑路斯王就屬於後者，在以往對卑路斯銀幣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卑路斯銀幣只有兩種式樣。在中國發現的卑路斯銀幣，已故著名學者夏鼐先生便將其分為兩式，即A式與B式，其實根據以後學者的研究，卑路斯即位之後就鑄有銀幣，這就是所謂的I式銀幣，I式銀幣王冠與耶斯提澤德一世（Yazdigird I 二九九—四二〇年）王冠相似，下部有一圈聯珠紋，王冠中央凸起一城齒，前部有一新月，頂部有兩條

細小的飄帶，上部托一圓球，只是在冠頂與圓球之間加一新月。冠頂與圓球之間加一新月的作法從巴赫拉姆五世（Yarhram V 四二〇—四三八年）開始，後為耶斯提澤德二世（Yazdigard gard II 四三八—四五七年）所沿用，關於加飾新月這種變化的原因人們尚不清楚，但估計為和拜火教有關則似無大錯。卑路斯的這頂王冠只存在了兩年即從公元四五九—四六一年，因為卑路斯二年的數字被打在一枚銀幣上。儘管如此，卑路斯也成為薩珊諸王中唯一一個連續擁有三個不同王冠的國王。從卑路斯三年開始存在於銀幣上的便是Ⅱ式王冠，也就是所謂A式銀幣上的王冠。那種帶翼翅的王冠B式銀幣，實際上應當是卑路斯Ⅲ式銀幣。夏鼐先生在談到A式與B式的區別時指出：「B式的特點是王冠的後部沒有雉堞形飾物（即城齒，引者注），卻換上一對翼翅，冠頂後面沒有兩條細飄帶，而在面前卻增加一條由肩上飄起的帶形物，和髻後的一條相對稱」（註六）如圖所示，冠後有沒有兩條細飄帶是區分Ⅱ式與Ⅲ式的重要特點。而Ⅲ式王冠後部沒有雉堞形（城齒），卻換上一雙翼翅的說法則不大準確，Ⅱ式，Ⅲ式銀幣的王冠上後部、中部都有城齒凸起，Ⅲ式銀幣在城齒之上才加飾雙翼狀物。肩部飄起的帶形物似乎沒有，如有也並非王冠本身的飾物。加飾這雙翼翅飾物的準確原因人們並不知道，波普（A. U. Pope）認為這雙鳥翅可能代表太陽，與波斯的宗教觀念有關。夏鼐先生贊成這種觀點（註七），R·戈倍爾（Robert Cobl）認為，這是勝利之神的雙翼被加在王冠的頂端，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可能與卑路斯被俘事件有關（註八）。卑路斯與嚙嚙人作戰被俘事件，發生在公元四六九年左右，而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卑路斯Ⅲ式銀幣的鑄造年代，大都不很清楚，不能證明這種推測。陝西耀縣寺坪村塔基下石函中出土一枚卑路斯Ⅲ式銀幣，這是在中國出土的卑路斯Ⅲ式銀幣中，唯一一枚經過鑄造年代鑒定的銀幣，據夏鼐先生鑒定的年份為「TRIN」也就是卑路斯二年即公元四六〇年（註九），這一年代的斷定是非常可疑的，因為Ⅲ式銀幣上的王冠出現時間，不大可能會這樣早，該年代大約正是卑路斯使用Ⅰ式王冠的年代，流行的應該是Ⅰ式銀幣。

卑路斯時代流行三種貨幣計量單位，奧博爾（Obol），第納爾（Dinar）和德拉克麥（Drachm），前兩種單位很小，是輔幣，德拉克麥的重量一般在四克左右，我們發現的這兩枚Ⅲ式銀幣屬德拉克麥，只是重量略輕一點而已。

## 二、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品

金幣，共四枚，為敘述方便起見，我們逐一編號。

一號金幣，唐代儀鳳三年（公元六七八年）史道德墓出土。

金幣直徑二厘米，重四克，正面是一個東羅馬皇帝的正側面肖像，頭戴盔，頭盔用小聯珠組成，耳際有垂索，身穿鎧甲，甲的邊緣也用小聯珠紋組成，肩扛一短矛或標槍，銘文已經由於磨損而模糊不清，其正面頂有一小穿孔。背面為一勝利女神像，十分模糊，大概她手中握一長十字架，另一手執一小金球，基本侷限一個長方框中，周圍為一圈銘文。銘文是拉丁文，一般採用省略的縮寫，左側銘文前幾個字中有一個完全不清，另一個字母好像是「E」其餘幾個是清楚的「NO」，接下來是「KI」，右側有兩個字母可以看清「DN」，其餘的銘文均已不清。

這枚金幣和東羅馬差諾皇帝（Zeno四七四—四九一年）的金幣較為相似，但銘文多已看不清，差諾皇帝金幣正面銘文「DNZENDEPPEAVG」，參照以往學者對省略字母的補充可知完整的銘文為：D (ominus) N (oster) ZENOPEP (er) P (etrus) AVG (ustus) 可以譯為「我們的主宰差諾永遠是我們的皇帝」【註一〇】。背面有一位勝利女神，稱作維克特麗（Victoria），靠左邊附有其名字，字體較粗。右邊的銘文為「AAYGGG」，譯為「帝國的勝利」。GGG代表著奧古斯都時期的羅馬帝王們，他們常以復數形式出現。錢幣廠編號和代表君士坦丁堡金本位制字母，已經完全看不見了。就其所看見的拉丁字母而言，完全是較為粗俗字體，非常不正規。雖然這枚金幣的直徑和重量都與真幣相差無幾，但很可能是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品，整個打押的王像等圖案是不很清楚的，字母也並非像真正的東羅馬金幣那樣採用規則的拉丁文，而是有些變形。它所依據的原型應當是五世紀的拜占廷差諾金幣，在晚期的拜占廷金幣背面都有十字架，是基督教作為國教的標志，而勝利女神手中拿的小金球則是君主權力的象徵。金幣表面紋飾磨損的非常厲害，說明它距離鑄造年代已經很遠，傳過許多人之手，和前述的卑路斯銀幣一樣，金幣上有一個穿孔，那是為了防止遺失，最後的擁有者可能用作裝飾品。

二號金幣，唐代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史索巖墓出土。

金幣直徑一點九厘米，重零點八克，已經被剪過邊，僅餘中間部分，很薄，單面花紋，上下均有一個穿孔。正面為一東

羅馬皇帝半身肖像，頭戴盔，身穿鎧甲，肩扛一短矛，耳際似有飄帶，盔完全用小聯珠紋組成，雖有銘文但已經大都不清，不可以辨認。

### 三號金幣，唐代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史訶耽墓出土。

金幣直徑二點三厘米，重二克，有一周弦紋形成邊框，外邊較寬，單面花紋。正中為一東羅馬皇帝肖像，頭戴盔，身著甲，肩扛一短矛。有一周銘文，銘文大多已經變形，除去個別字母之外，很難辨認。

真正的東羅馬金幣一般由正反兩面組成，但二號、三號金幣，僅有一面，而且圖案有許多不清，例如真品的面目清晰，耳、目等部位比例適度，而這兩枚金幣上的王像，眼睛很大耳朵也很大，不適比例。真品的矛頭很小，而這裡的矛頭很大，並成圓三角形，鎧甲的紋路也紛亂，銘文的字母則都不可以辨認，顯然是兩枚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品，而且這兩枚金幣所使用的模具是經過二次以上的翻刻，所以其準確性很差。早期的東羅馬金幣正面有許多皇帝是採用這種頭戴盔，身著鎧甲，肩扛短矛的正面肖像，判斷其確切年代只能憑藉銘文，這兩枚仿製品的仿製準確性很差，很難具體地斷定其模擬的原型，只可判定為是仿照五世紀或六世紀某一皇帝的金幣製造的。

### 四號金幣，唐代咸亨元年（六七〇年）史鐵棒墓出土。

金幣直徑二點五厘米，重七克。單面打押花紋，正面上方有一小穿孔，穿孔口有打磨過的痕跡。中為一國王側面肖像，頭戴王冠，腦後飄髮，眼睛較大，鼻子凸尖，身著鎧甲，頭部有項圈，周有一圈銘文。銘文除去個別字母以外，大都不可以辨認。

## 三、東羅馬金幣仿製品的傳入

拜占廷東羅馬帝國自南北朝時期就與中國產生了頻繁的交往，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帝國的遺物，以東羅馬金幣為最多，據現在已經公布的大約有二十七批發現地點，共約有三十三多枚。

### 附表二、東羅馬金幣及其仿製品中國發現地點統計表

寧夏固原出土的外國金銀幣考述

出土地點	出土時間	埋葬時間	數量	金幣年代	資料來源	備註
新疆和田	一九一四年	不詳	一枚	查士丁		
新疆阿斯塔那一區三墓	一九一五年	六世紀左右	一枚	查士丁一世		
新疆阿斯塔那一區五墓	一九一五年	六世紀左右	一枚	查士丁一世		
新疆阿斯塔那一區六墓	一九一五年	六世紀左右	一枚	同上	A. Aetern. Lamerino	
甘肅武威康阿達墓	一九一五年	唐代	一枚	不詳	夏鼐《考古學論文集》	可能屬羅馬金幣
陝西咸陽獨孤羅墓	一九五三年	六〇〇年	一枚	查士丁二世	《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二期	
內蒙古土默特左旗畢克鎮墓	一九五九年	六世紀左右	一枚	列奧一世	《考古》一九七五年二期	
陝西西安土門村二號唐墓	一九五六年	七世紀後半	一枚	赫拉克留斯一世仿製品	《考古》一九六一年八期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M九二墓	一九六一年	唐代	一枚	仿製品	《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一三八墓	一九六一年	唐代	一枚	未鑒定	《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	
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一九六九年	七五六六年	一枚	赫拉克里留斯一世	《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	

西安東郊徵集	一九七九年	不詳	一枚	同上		
西安唐長安城西市	一九七九年	不詳	一枚	同上		
西安西郊飛機場	一九七九年	不詳	一枚	同上		
咸陽機場賀若厥墓	一九八八年	武德四年 (六二一)	一枚	查士丁尼二世	《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三年六期	含在口中
甘肅天水	一九八九年	不詳	一枚	佛卡斯	同上	估計為墓 葬出土
遼寧朝陽唐墓	一九八九年	不詳	一枚	希拉克略	《第三次絲綢之路貨幣學術討論 會》論文	
西安東郊唐墓	一九八九年	七世紀中葉	一枚	仿製品	《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二年五期	含在口中
寧夏固原南郊鄉史訶耽墓	一九八六年		一枚	仿製品	未刊	
寧夏固原南郊鄉史索殿墓	一九八五年		一枚	仿製品	未刊	含在口中
寧夏固原南郊鄉史道德墓	一九八一年		一枚	仿製品	《中原文物》一九八二年三期	握於手中
河南洛陽龍門安菩墓	一九八一年	七〇九年	一枚	佛卡斯	《文物》一九八五年一期	含在口中
內蒙古武川縣烏蘭不浪鄉	八〇年代初	不詳	一枚	未鑒定	《內蒙古金融》八七年八期	
河北磁縣東魏閻氏墓	一九七三年		一枚	查士丁與查 士丁尼共治		
河北磁縣東魏鄒和公主墓	一九七七年	五五〇年	二枚	尼洽共一枚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	一九七四年	七世紀左右	四枚	阿那斯塔修 斯一枚查士 丁與查士丁 尼洽共一枚	《文物》一九八四年四期	
河北贊皇李希宗墓	一九七三年	五七六年	三枚	不詳		
				狄奧多西二 世一枚查士 丁與查士丁 尼一世共治	《考古》一九七七年六期	

從以上二十七個發現地點來看，基本上可以確定是東羅馬金幣仿製品的大約有十餘枚之多。

一九一五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 (A. Stein)，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斯坦因編號的第一區三號，五號，六號墓中發現三枚金幣，墓地的年代一般訂為六—七世紀。這幾枚金幣的質地薄而輕，均為單面打押花紋，依照斯坦因先生的鑒定結果，這些金幣都是東羅馬查士丁一世 (Justin I, 527—565年) 金幣的仿製品【註一一】。

一九五六年，西安市西郊土門村M2號墓中出土一枚金幣，該墓的年代屬於盛唐時期約相當於公元七世紀後半。據夏鼐先生研究可以斷定它是希拉克略 (Heraclius, 另譯赫拉克里留斯，610—641年) 一世金幣的仿製品【註一二】。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期間，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發掘的墓群中亦有東羅馬金幣出土。TAM92墓，TAM38墓均有東羅馬金幣出土。其中M2墓的金幣明顯的是仿製品，正面為一皇帝肖像，銘文模糊，邊緣較寬，很可能是單面打押花紋。有關這一墓地的詳細情況我們還不太了解，但很可能不止這兩枚金幣，從已經發表的TAM48墓的平面圖來看，墓主人口中含有金幣片。這幾座墓葬的時代大約為盛唐時期【註一三】。

羅馬金幣在公元四世紀時，由君士坦丁 (Constantian) 大帝主持進行了幣制改革，由過去較重的金幣，改為「索里得」 (Solidus)，每枚的重量約在四點五克左右。中國目前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品所依據的原型，應當是這種「索里得」。有關東羅馬金幣仿製品的研究。中國學術界除去夏鼐先生對於一九五六年西安土門村唐墓出土的那枚希拉克略仿製品有所涉及以外，其他仿製品很少有人涉獵。夏先生指出：「我們知道希拉克略在位(610—641)的後期，正是阿拉伯帝國崛起時期，阿拉伯人為了維持新征服地區的經濟制度，並且大約從六三五年起便開始仿製拜占廷的金幣和銅幣。」【註一四】對於其他仿製品的仿造地點我們並不十分清楚，不過，與新疆吐魯番、寧夏固原地出土的這類仿製品類似的東西，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發現。例如在德國漢諾威下薩克遜州博物館，就收藏一枚出土於不論瑞典克城附近的Ofriehar地區墓葬的東羅馬金幣，金幣也是仿造差諾時期錢幣，除去拉丁文字母不大規範外，還帶有一個小柄【註一五】，這和斯坦因在新疆吐魯番發現的那枚帶小柄的仿製品在造型上非常相似。對於新疆地區出土的仿製品，G.考尼格 (Gerd G. Koening) 先生認為，那是由於人們在缺乏拜占廷錢幣樣本的情況下，出於競爭的目的而製造成的【註一六】。從其所暗示的原因來說，大約是指六世紀中薩珊

王朝對於拜占廷帝國的成功封鎖，按照十九世紀以前西方人的觀點，東西方交流的遠途貿易主要是由波斯人和羅馬人組織進行。中亞奢侈品貿易，曾經給東方帶來了動蕩不安，波斯人很早就活躍在這條東西方國際商道上，壟斷著這條道路上的貿易權，並對拜占廷帝國實行禁運。拜占廷對於東方絲綢的需要，迫使它急於要打破波斯人對中國貿易的封鎖，六世紀中東羅馬與波斯薩珊之間屢有戰爭發生，最後以東羅馬戰敗告終。直到查士丁尼二世（Justin II. 五六五—五七八年）時，東羅馬才與東方的突厥取得聯繫〔註一七〕，但對整個貿易制控權影響不大。六世紀中葉後實際操縱中「絲綢之路」的不是別人，而是中國史籍中一再提及的「昭武九姓」人，也就是粟特人。粟特人充分使用地利之便，成功地利用突厥人與波斯人的矛盾，掌握了對中國貿易的主權。由於貿易的需要，公元五世紀初，粟特地區開始仿造銀幣，主要是模仿製造薩珊王朝巴赫蘭拉姆五世銀幣，以後也仿造了大量中國方孔圓錢，上面有粟特銘文，一些學者稱之為突騎施圓錢，這種錢在我國的新疆甘肅地區均有發現。但是關於該地是否仿造東羅馬金幣我們所知甚少，不可以排除粟特地區仿造的可能性。這些仿製金幣的祖型一般都很早，說明仿製者所都得到的金幣樣本是六世紀以前的，由於薩珊人的封鎖，仿造者得到的不大可能是同時代的金幣，而只能是較早的。那麼其仿製者應當是薩珊王朝以外的人，這樣中亞粟特地區便是理想的仿製地點。十九世紀以後隨著東方學的深入，西方學者才開始注意到中亞粟特人的作用，粟特人有著利之所在，不遠千里而去追尋的精神，我們所看到的大量出土唐三彩駱駝上騎的胡人就是粟特人。渴望著同東羅馬人進行貿易往來，很可能是刺激這種仿製的直接原因，後來他們甚至同東羅馬人也有所聯繫。根據一些國外學者的推斷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地點，七世紀以後主要是在阿拉伯地區，而在此之前的仿製地點，大約在東方中的某一地區，流傳於世界各地的這種金幣，從那裡通過漫長的「絲綢之路」運往各地，當然也流行於中國。這與我們推測的粟特地區也相吻合，固原、洛陽「昭武九姓」人後裔的墓中發現東羅馬金幣仿製品，應當是情理中的事。

#### 四、薩珊阿爾希爾三世金幣的仿製品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固原南郊唐墓出土的四號金幣、正面像完全呈側面，不大可能是東羅馬金幣或其仿製品。東羅馬金幣一般從六世紀初便完全採用正面肖像，在此以前的羅馬金幣多採用側面像。東羅馬金幣的側面像，有的戴王冠，有的不

戴王冠，有的僅戴頭飾。表現在金幣上王冠一般是軟冠，或貼髮冠，而這枚金幣上的王冠卻是帶城齒的，這種城齒狀王冠，一般多見於薩珊錢幣王像。東羅馬金幣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如王像是正面肖像，王像的身體也是正面，如是側面肖像，王像的身體也呈側面。而這枚頭側身正的形象，則見於薩珊錢幣，這樣這枚金幣肯定與薩珊錢幣有關。

薩珊金幣在全世界發現的很少，中國境內則完全沒有發現。雖然這枚金幣上的國王名字的字母已完全不清，但是比照以往發現的薩珊銀幣，可以肯定的說，金幣與阿爾達希爾三世（Ardashir III, 六二八—六三〇年）國王有著密切的聯繫。薩珊金幣的鑄造，本來並沒有一個嚴格的計劃，完全是表現薩珊王朝的顯赫，是一種紀念性質錢幣。與銀幣相比也沒有一個法定的比價，實際上只能是銀幣的一種輔幣，僅在沙普爾二世（Shapur II, 三〇一—三七九年）時，由於東方戰爭的需要，起過重要的作用。其他國王只是遇到節日才發行金幣〔註二八〕。阿爾達希爾三世時，有沒有發行過這種金幣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通過與該王銀幣的比較，我們仍然可以研究清楚四號金幣。

阿爾達希爾三世銀幣共有二式，目前在中國境內均未發現，這兩式銀幣的主要區別仍然在王冠以上的部位。I式銀幣王冠上只有一新月托球，II式銀幣王冠卻在冠頂之上加一雙翼狀物，然後才是新月托球，但是這些細節對我們研究四號金幣卻幫助不大，因為在四號金幣的冠頂上這些特徵性的裝飾已經被省略，但從王像上依然看出一些阿爾達希爾三世的特點。一般的波斯銀幣，由於在位的國王大多數為成年人，所以大部分都有連腮鬚鬚，而阿爾達希爾三世的即位，實際上是由於居和多二世（Kavadh II）病死的結果，他即位時實際上還是一個孩子，借用摩根的描述「這是一張年青而缺少經驗的臉」〔註一九〕，從銀幣的王像上是可以看出的。阿爾達希爾三世肖像頭側向右，頭戴城齒狀王冠，眼臉較大，鼻高而拳，無鬚鬚，瓔珞從而肩斜垂繞至胸前，頭戴項鍊，項鍊連接處有一圓形飾物，下垂三個棒狀飾件，銘文從眼前一直繞至腦後。

阿爾達希爾三世銀幣上正面銘文為：參照摩根的轉寫為「AFZUNARTASATR」，其意譯為「昌盛的阿爾達希爾」。值得更進一步注意的是，除了冠前有一新月托一五角外，在其右肩上部，無論I式，還是II式銀幣都有一個新月，以上這些特徵四號金幣上均完全具有。依照薩珊錢幣學家摩根、渥爾克（J. Walker）的看法，阿爾達希爾三世的銀幣已經屬於一種非常少見的錢幣。

四號金幣重量達七克之多，似乎已經超過了東羅馬金幣「索里得」許多。薩珊金幣的重量單位沿襲的是羅馬舊制，在阿爾達希爾一世（Ardashir I）和沙普爾三世期間，標準的金幣單位第納爾重量在七至七點四克之間，大致相當於流通的羅馬錢幣「奧勒斯」（Aureus）重量。第納爾在沙普爾二世時重量減少已經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一直下跌，卑路斯即位後，由於他們金幣鑄造政策極不明確，而使他的第納爾重量只有三點五克。卑路斯以後的薩珊王曾努力使第納爾的重量回升到四點二克，從而與東羅馬「索里得」相當。巴赫拉姆四世（Varhran IV, 五九〇—五九一年）的新制表明，過去那種七克左右的第納爾沒有被廢棄，與新的第納爾並存，大約相當新第納爾價值的一點五倍【註二〇】，這種政策一直持續到後來。四號金幣的重量應該是以那種七克左右老式第納爾為單位的產物。金幣僅有單面花紋，省去了背面及前面一些特徵性的地方，明顯不是薩珊金幣的真品。但從重量上來很可能按照阿爾達希爾三世金幣所仿造的。

那麼仿造這種金幣的真正背景如何，以及仿造人、仿造地點都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阿爾達希爾三世在位年代，是一個非常混亂的年代。薩珊帝國國際、國內矛盾日趨突出，自公元六二八年庫思老二世（Khosroes II, 五九〇—六二八年）去世以後，國內局勢逐漸惡化，到耶斯提澤德三世（Yazdgerd III, 六三二—六五一年）即位時，這短短的四年時間，據認為被加冕為薩珊王的人不下十二人【註二一】，使薩珊帝國完全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阿爾達希爾三世在位僅一年多便被部將所殺。與此同時阿拉伯帝國迅速崛起。公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年高資深的艾卜·伯克爾成爲第一位哈里發，在短時間內發動一次又一次的統一戰爭，很快阿拉伯半島便統一在穆斯林的旗幟之下。出於宗教、經濟的原因，哈里發的寶劍指向了東羅馬拜占廷帝國和波斯薩珊帝國。敘利亞、伊拉克被征服，從七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阿拉伯人與薩珊人之間進行了一系列惡戰，新興的阿拉伯人不但戰勝了薩珊人，而且奪取了包括首都泰西封（Tespion）在內的大片領土，阿拉伯史家對薩珊王棄城而逃和在首都奪取的大量戰利品、財寶進行了大事渲染。由於得到了耶斯提澤德三世所組織的頑強抵抗，阿拉伯人在薩珊領土上取得的初步征服，大約花費了十幾年工夫，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時，持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波斯帝國，終於在「真主的寶劍」之下悲慘地結束了。與此同時拜占廷帝國東部最富饒的幾個省區，也被納入了阿拉伯人版圖【註二二】。早期的征服者由於來自沙漠，經濟上不得不依附於被征服地區的留用人員。貨幣制度上，早期幾位哈里發歐麥爾、穆阿威等人在征服地

區都流行外國錢幣。東羅馬金幣和波斯薩珊銀幣，只有在某種可能情況下，才在這些外國金幣上打押某些《古蘭經》內容的銘文。新疆烏恰山中就發現數量很多的庫思老二世銀幣，銀幣正的空白邊緣處打押有阿拉伯銘文〔註三〕。這時期也鑄造少量的金銀幣，但這些金銀幣完全是仿照拜占廷金幣和薩珊銀幣的式樣鑄造的。前述西安土門村出土的那枚希拉克略金幣的仿製品，就是在這種背景一製造的。波斯銀幣的仿製品在中國也有發現，西安近郊三十號唐墓中出土一枚仿製品，單面打押花紋，圖案粗糙，肖像模糊不清，邊框不是由聯珠紋組成，代之的平滑的線條。夏鼐先生推測其仿造年代時說：「因它所仿的祖型是庫思老二世或更晚的薩珊朝銀幣，所以最早也不會超過第七世紀前半期，」〔註二四〕雖然夏先生沒有明說製造者是誰，但實際上他仍然認為是阿拉伯人仿造的。直到公元六九五年，阿卜杜勒·麥克才在大馬士革鑄造出了純粹的阿拉伯式金幣第納爾和銀幣第爾汗。

一般的認為在仿製的拜占廷錢幣中沒有銀幣，在仿製的薩珊錢幣中，沒有金幣〔註二五〕，但凡事情總是有例外的，四號金幣無疑是按照薩珊錢幣作造的。但是為什麼在很厚的金幣上只有正面王像而沒有背面呢？我以為這應與仿造者的宗教信仰有關。薩珊錢幣的背面中間一般是拜火教祭壇，祭壇兩邊立著拜火教祭司，正面王冠的頂部有新月托球，在拜火教教義中是崇拜天體的象徵，這一切都不合乎伊斯蘭教規。而在阿拉伯人征服的領土上伊斯蘭神權高於一切，歐麥爾所採用的最主要理論便是：阿拉伯半島上只允許伊斯蘭教存在。其他異教徒如果改奉信伊斯蘭教，那麼他將得到特別的照顧，從而使拜火教遭受最沉重的打擊，這樣也就不難理解這枚金幣上為什麼只有單面，要省去王冠一裝飾物的原因。其製造者只能是阿拉伯人，仿造時間應當在阿拉伯人部分地占領了薩珊地區以後，其確切的時間為公元七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期。這一年代與四號金幣的埋藏年代公元六七〇年，僅有幾十年之隔。

## 五、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銀幣的若干意義

固原南郊隋唐墓出土的這幾枚仿製金幣及波斯銀幣，發現時均放在墓主人頭部，由於這些墓葬均遭盜掘，可能原來是含在墓土人口中，如一號金幣就含在土人口中，是一種葬俗。關於死者口含金幣的習俗，在中外東西大化研究者中產生十

分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開始本世紀初。斯坦因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發現三枚東羅馬金幣作製品和一枚薩珊銀幣，這些金銀幣都在死者的口中，他非常容易地將這一習俗與古希臘神話聯繫起來。依照希臘神話，人死去以後要到一非常遙遠的地獄世界（Hades），人的亡魂要由赫爾墨斯（Hermes）領至冥國的門口，再由卡戎（Charon）用渡船將其靈魂運過斯蒂克斯河（Styx），有人們爲使靈魂能平安到達，要付給卡戎擺渡錢，所以希臘人一般要在死者的口中放置一枚錢幣作爲渡河之用，多放一枚奧博爾（Obol），後來的羅馬人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受西方文化背景影響的斯坦因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這一習俗，但是斯坦因接著又寫到，一九一六年博學的沙畹（E. Chavannes）博士又非常親切地告訴他一本漢譯佛經中也有這樣的故事，既便是在東戶的人們也知道這一內容。由於中國沒有鑄造金銀幣的習慣，斯坦因亦將故事與阿斯塔那墓地金幣聯繫起來，但其究竟與西方金幣習俗之間有何關係，限於手頭資料，他提議留給以後的學者去研究〔註二六〕。

許多年以後，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研究薩珊銀幣時又涉及到這一問題，這時的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類似的新發現又有許多。夏鼐先生深情的寫道：「這種說法（指金幣與古希臘之間的關係）最近仍有人附和。實際上它是受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流毒的影響，事實證明它是錯誤的。我國在殷周時代便已有死者含貝的習俗，考古學上和文獻上都有很多證據。當時貝是作爲貨幣的。秦漢時代，貝被銅錢所取代，將銅錢和飯珠玉一起含在死者口中，成爲秦漢及以後的習俗，」接著又例舉了廣州、遼陽及安陽漢、隋唐墓中一些銅錢的情況，說明「高昌這種死者口中含錢的習俗當溯原於我國的內地」。〔註二七〕夏鼐先生的觀點無疑有非常可取的一面，但是死者口中金幣的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獲得解決，有人依舊不以爲然或堅持斯坦因的觀點。

近年間，日本學者小谷仲男教授在這一問題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以《有關死者口中含貨幣的習俗——漢唐墓葬中的西方要素》爲題，發表了他研究這一問題的全部成果〔註二八〕。小谷先生在考察中國近年間吐魯番和其他地區死者口中含幣習俗以後，對於夏先生的觀點提出質疑「從中國埋葬制度的變遷中，雖不能排除含玉（蟬形）、握玉（豚形）會被貨幣所替代，但是，人們相信具有神秘靈力的玉和作爲交易媒介的貨幣大致上還是有區別的，這兩種隨葬品在漢唐墓中是並存的，基本上存在於同時代，口中、手中含握貨幣的葬法，不屬於以上情況，應該考慮是在另外思想背景下的產物。」接著小谷先生

又以相當的篇幅介紹了中亞地區墓葬中死者金幣情況。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蘇聯、阿富汗聯合考古隊在阿北部提利亞泰培 (Tillya Tepe) 發掘成果，即著名的「大夏黃金遺寶」(Bactrian Gold) [註二九]。其墓葬被推測是貴霜時代某翁侯或大月氏王。第三號墓死者腳下有羅馬皇帝提比留 (Ti. Deias) 金幣，手中握有帕爾提亞銀幣，第四號墓死者胸部有佉盧文金幣，第六號墓死者口中含帕爾提亞 (Partia) 銀幣，左手中握帕爾提亞金幣，其發掘者維·沙里阿尼迪 (V. Sarianidi) 氏報告亦將此和古希臘渡河冥資聯繫起來。另外在中亞的過去發現中有許多墓葬中死者口含金銀幣。

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塔吉克共和國首都杜尚西北吐普哈納 (Туп—Khona) 墓葬中有兩枚銀幣發現於死者口中，另兩枚出現在死者身上。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七一年在同一地點的一四六座小型墓中，有八枚在死者口中，四枚在胸上，骨盆處有二枚。

一九五五—一九五九年在卡菲爾尼河中游西側吐爾哈爾 (Tul'khar) 墓葬中發現死者口中金錢的有兩例，頭上方發現有一枚，另外身體上發現錢幣的有一例。一九七二年在該河下游亦在死者頭骨上發現十二枚錢幣。

另外在烏茲別克共和國蘇爾汗河流域比特泰培 (Bii—Tepe) 墓地，幾乎所有的死者口中都含錢幣，有一例還含二枚。時代約為七—八世紀。

總之，中亞地區從公元一世紀至八世紀墓葬中都有含錢的習俗。但是古希臘墓中發現口中含幣習俗則從公元前四—五世紀開始，顯然比中亞的這類習俗為早。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中亞墓中都有這種含錢的習俗，但是它們無疑代表一種習俗。

那麼沙畹博士告訴斯坦因佛經中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三國時中亞康居人康僧會編譯的一部佛經《六度集經》第六十八品中這樣寫道：

「昔者菩薩，為獨母子，朝詣佛廟，捐雅崇貞，」「所處之國，其王無道，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無常，自惟曰吾為不善死將入太山乎，何不金聚以貢太山王邪。」於是，斂民金，設重曰：「若有匿銖兩之金，其罪至死」。如斯三年，金全都盡。王訛募曰：「有獲少金貢王者，妻以季女，賜之上爵」。童子啟母曰：「昔以金錢一枚，著之父口，欲以賂太山王，

今必存矣，可取之獻王也」。母曰：「可」。兒取獻焉。王令錄問所由獲金，對曰：「父喪之時，以金著口，欲賂太山王。實用大王設爵求金。始掘冢發木求金。」王曰：「父喪來有年乎？」對曰：「十有一年」。曰：「爾父不賂太山王邪？」對曰：「衆聖之書，唯佛教真。佛經曰，爲善福建，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響焉。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關響，其可獲乎？」王曰：「不可！」曰：「夫身即四大也。命終四大離錄逝變化，隨行而亡，何賂之有。大王前也布施爲德，今獲爲王，又崇仁愛，澤及遐爾，雖未得道，後世必復爲王」。王心歡喜，大赦獄囚，還所奪金。

小谷先生說考慮到編譯者祖先是康居人，這個故事很可能首先流傳於中亞地區。鳩摩羅什（三八四—四〇三年）所譯的《另一部佛經似乎比前者更忠實於原著》。《大莊嚴論》第十五品云：

「有一國王，名難陀。是時此王聚積珍寶，規至後世，貪聚一國之財，故以自己女置淫女樓上。時有一後生，心甚敬愛，遂往發父冢，開口取錢，王聞是已而自忖，我先聚一切寶物，望持此寶於後世，此無益也。」

其梵文原著由德國人發現於新疆克孜爾，文中顯然不是以中國爲背景的，應當是產生於中亞貴霜地區，佛經故事的編寫也應是以貴霜人爲傳播對象，主要是適應貴霜人具有的口味。

亞歷山大東征以後帶來希臘許多東西，在東方建立殖民統治，其藝術、習俗也應隨之而傳播。前述的「大夏黃金貴寶」和本世紀初「午澗河（Oxusriver）遺寶」【註三〇】中有許多希臘羅馬式藝術品。口中含幣的習俗也隨之傳播，但是到了後來，我們不能說中亞含幣習俗完全是希臘「冥國渡資」的翻版，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確切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國文獻中稱之爲祆教）在中亞的傳播亦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大夏黃金遺寶」中翼獸、翼人明顯受到這種影響。七至八世紀索格底亞那（Sogdiana）地區墓中口含錢幣較前期多起來，不能說完全與宗教無關。

中國古代史籍中雖沒有死者口含錢幣的記載，但是與之相似的載錄卻也能說明很多問題。《太平廣記》卷四〇二引《獨異志》李灌條：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待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

珠內胡口中。植木誌墓。其後十年，復過舊邑，時楊憑為觀察史，有外國符牒，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梏訊經年。灌因問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縣寮，偕往郭墻伐樹。樹已合拱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在」。李灌所葬之人是否波斯人，尚有可疑之處，但其為胡人則正確。胡人有一珠，本是送給李灌的。但是李灌卻在埋葬胡人時將珠放置於胡人口中，顯然這並非胡人生前遺愿，李灌這樣做的原因，似乎只有這樣的解釋，他比較熟悉西域胡人的埋葬習俗，具體的說，他知道胡人死後葬時口中當含有珠寶之類的物品。口中含寶珠的功能，主要是為防腐，其十多年以後，挖掘胡人墓後，由於口中含珠，其貌如生前一樣。胡人葬時口中含珠的記載，另外在李勉條亦有記載，一波斯胡人，其本王種，亡國後商販睢陽，於人體肉中藏價值百萬的寶珠，其死前將珠贈於李勉，「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後其後人訊及葬地，發墓取之而去。《太平廣記》同卷亦載「又尚書故實載兵部員外郎李約，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與此二事略同。」可知類似的記載表明，西域胡人葬時含珠是一種特有的習俗，並為世人所熟知，大家都遵守這種習慣，即便是胡人已在生前將寶珠贈人，受贈人亦恪守其俗。當然這裏的波斯胡人，是否真正的波斯人尚有疑問，或許其為中亞粟特人。但是這種含珠習俗，當與口含金銀幣的習俗無疑具有同樣的意義。至於由於西域胡人口中含珠，葬十多年掘出之後仍面如生，顯然是按照中國傳統觀念進行加工過的，是否胡人具有不腐如生的思想，我們不得而知，但聯繫為受一種宗教影響則是很有可能的。

除去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以外，中國內地所發現的中亞粟特人墓葬很少，在有限的一些中爾經科學發掘者更少。但從中仍不難看出其習俗。固原南郊粟特人墓地中出土有薩珊銀幣、薩珊金幣和東羅馬金幣仿製品亦表明，口中含金銀幣的習俗是這些人從中亞帶過來的習俗並傳至其後裔。一九八一年在河南洛陽發現安菩墓〔註三一〕，據墓誌記載安氏係中亞安國人後裔，他手中握有一枚東羅馬福佛克斯（FODAS）金幣，與前述中亞人口中含握錢幣習俗完全相同。

一九八一年西安市曹家堡村發現一座初唐墓葬〔註三二〕，從發掘者繪制的平面圖看，可能在墓主人頭部地方出土一枚圓形金飾，由於盧骨已經化為粉灰，很可能原來含在口中。發掘者曾將這枚圓金飾的拓片送於夏鼐先生，據稱夏鼐先生曾復信云：「拓片正背兩面相同，僅一面凸出，一面凹入，不是貨幣，當是飾物。」金片很薄，直徑二厘米、重零點九七克，上單

面打押一個深目高鼻，多鬚鬚的胡人頭，周旁邊有一周聯珠紋樣，頭冠上也飾一同聯珠紋，極有可能是某一西方貨幣的仿製品，在仿製幣中單面打押的情況會常常出現。

一九八九年西安東郊發現一座高宗前後的墓葬〔註三三〕，在有可能是墓主人頭部的地方發現一枚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品〔註三四〕，直徑一點一五厘米、重零點八克，也是單面打押花紋。

一九八八年咸陽國際機場發現賀若厥墓葬〔註三五〕，賀若氏葬於唐武德四年（六二一年），其口中含有一枚東羅馬查士丁尼二世（Justin II, 五六五—五七八年）金幣，直徑二厘米、重四點一克。非常有趣的是賀若氏是隋代大將軍獨孤羅的妻子，獨孤羅的墓葬在五十年代初被發掘，墓中也出土一枚查士丁尼二世的金幣，夏鼐先生曾經有過卓越的研究〔註三六〕，以此推斷，獨孤羅的那枚金幣原來含在口中的可能性很大，可惜現在已無從得知。獨孤羅曾在隋開皇十三年（五九三年）為「使持節，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此蕃路出玉門，山連梓嶺。地多關塞，俗染華戎。」〔註三七〕，他們長期生活在涼州，肯定深受「俗染華戎」的影響，死後行口含外國金幣的習俗，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應當指出，內地口手中含握金銀幣（主要是指外國錢幣）的現象，決不是孤立的幾例，隨著以後考古發掘工作的不斷開展，內地中亞後裔墓中將亦會有不斷的發現，其宗教原因當大於其他方面的因素。中國內地漢唐間除了以上兩處墓地有墓誌明文記載屬於中亞昭武九姓人後裔，其口手含握金幣的現象可與吐魯番乃至中亞墓葬中的習俗同等看待而外，像小谷先生在大著表一中所例舉的那些漢至隋唐時期死者口手含握錢幣的情況，似乎暫不能視作是受西方因素影響的結果。因為從其分布範圍而言有華東、西南、華北、中原和西北幾乎包括大半部中國。換句話，這樣的分布可不像小谷先生所說的那樣具有某種規律，所謂「半月狀」分布當概括不了。死者的情況則更複雜一些，沒有更多的材料能證明除史氏墓、安菩、獨孤羅夫婦等墓外，其他人與中亞之間的關係，那怕是很小的一些。總之，死者口手中含握金幣，無論在中亞、新疆吐魯番或中國內地，其所得到合理的解釋應該只有一個，他們或同為中亞人，因此共同信仰一種宗教的可能性當有所考慮。另外一點也較重要，他們口手中含握的一般是一種價值昂貴的外國金銀幣，其他人則使用的是低廉的銅幣，除去社會經濟地位外，也許內含著其他因素。要之，雖然在死者口手含錢幣的習俗，起源於古代希臘，他們使用的是奧博爾（Obol）幣制單位，中亞地區的這種習俗顯然與古希臘習俗有某種淵源關

係，但就其深刻含義而言，明顯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目前推測為與中亞地區流行的某一宗教或為拜火教信仰有點聯繫。中國吐魯番和內地固原、洛陽、西安等地死者含幣習慣與中亞地區是一脈相承的，表現出一種淵源關係。中亞、中國內地的發現表明，雖然古希臘習俗對其有所影響，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主要原因是傳統不同，古希臘死者口中含奧博爾，這是一種很小單位的貨幣大約只相當六分之一德拉克麥，主要用作輔幣，薩珊王朝就流行這種幣制，如前述卑路斯朝就有，中亞地區的發現我們不清楚，而在中國境內截至目前還沒有發現一枚奧博爾。而在中亞、中國發現中死者一般使用較奧博爾大許多的錢幣。還有像冥國實路錢的習俗中，是否使用像中國發現的那些金銀幣大都鑽過眼的這些細節，我們就更不知道了。

波斯銀幣和東羅馬金幣，是北朝、隋唐間具有國際貨幣地位的通用貨幣，既便是其仿製品依然不失其有同樣的地位，因為使用貴金屬仿造鑄幣，其流通價值是相當的。在中國境內發現的薩珊銀幣和東羅馬金幣及仿造品，一部分是由商賈們作為購貨的貨幣帶入，另一部分則是由一些私人如使節等作為紀念品帶入，並且都在中國部分地區流通，《隋書·食貨志》稱，北周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註三八〕日人桑原鷺藏，針對這種情況指出，東至支那（中國），西到羅馬，所有國家貿易，多使用羅馬貨幣，因此，認為河西地方所流通的金銀錢為羅馬貨幣，較為妥當〔註三九〕，夏鼐補充指出，其中的銀錢應當是指波斯銀幣〔註四〇〕。唐代初年高僧玄奘赴西域取經，途經河西地區，也注意到了當地使用金、銀錢的情況：「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石諸國，皆施珍寶」，「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諸寺」〔註四一〕。實際上這些所謂「西域金銀之錢」中的相當一部分是中亞仿製品，目前發現的三十多枚東羅馬金幣中仿製品大約占三分之一。總之，出土於中國的金銀幣都是國際貿易的產物，換言之，也就是說這些金銀幣，大多是商賈們從西域帶來的，這些商賈中有我們一再提及的中亞粟特人。從整個薩珊銀幣和拜占金幣及仿製品的流向來看，較早的遺物一般出現在新疆吐魯番盆地的綠洲上，所埋藏的墓葬是一般的中小型墓，而隨著時間的向後推移，出現金銀幣的墓葬，大多是內地的中大型墓葬，這種流向所顯示出的規律可能是，在靠近西域的地區，所能接觸到這些東西的人中有下層人員，可能從中亞商人手中直接得到。在中國腹地能夠得到這類錢幣人員的成份心發生了變化，一般是中上層官員才有可能

從商人手中換取，或接受饋贈。時間愈往後發現的錢幣愈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七世紀末，與當時東西方整個國際貿易形勢基本是相吻合的。

## 六、北朝至隋唐間途經原州的「絲綢之路」

無論其真正來源如何，這些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及仿製品的發現地點，大都應被視為與國際貿易通道「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關係。儘管我們在「絲綢之路」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實際上由於這條道路的構成情況十分複雜，由許多條幹線和很多條支幹線組成，尤其是中國境內的許多條支幹線，因不同時代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史料極為有限，研究工作所能得到的深入實際上是十分有限的，我們以下所討論的「絲綢之路」與固原的關係就屬於這種情況。

首先應當談及的是北朝時期高平（今固原）至平城（今大同）一線的交通情況。北朝初期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是平城，平城與「絲綢之路」的關係變得至關重要，過去的一般論著大多沒有涉及，有所涉及的有兩種路線。夏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張《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地點分布圖（附交通路線）》，在這張圖中的交通路線上的太原是從西安到達，而平城（大同）則是由西安轉道洛陽再抵河北定縣，最後到達大同。這樣的標法顯然夏先生以為「絲綢之路」通往雁北高原的道路是經中原轉道，甚至是由洛陽繞河北而抵達大同的。所以夏先生說：「在中國境內這些薩珊銀幣大部分出土於「絲綢之路」沿線，其東端終點應該是河南洛陽」（註四二），既然是大部分出土於「絲綢之路」沿線，那麼對於出土地點較遠的銀幣，當然應是例外於「絲綢之路」了。由於當時材料的局限。夏先生實際上沒有注意到河西走廊通往普北高原一條直達路線的存在。另外一種觀點倒是注意到這條道路的存在。一位學者在研究外國金銀幣在中國的傳播路線時，也繪有一幅交通路線地圖（註四三）。這幅地圖所標出的是二條由大同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線，依照第一條路線實際上主要在漠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的，要在途中經過許多沙漠、戈壁，不容易行通，人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果甚少；第二條路線是沿著河套平原進入河西走廊，其主要障礙應是穿越以騰格里沙漠為代表的沙漠、戈壁，有關這一問題討論也沒有獲得實質性的進展。那樣真正可行的平城（大同）通往西域的第三條道路是什麼呢？

我們非常想設法重現北朝至隋唐時這一線的「絲路」交通情況。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是有關中亞、西亞文物在這一線的分佈情況，當然個別孤立的這類文物發現，本身並不能使我們得出任何可靠的結論，錢幣的出現尤其是這樣。但是如果這類發現的地點在分布空間上形成某種固定的格局，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有理由使人們相信，這些外來文物與活躍於「絲綢之路」上的中外商團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在研究這些遺物有中國的傳播路線時，已經注意到了以下一此事實。一九五九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山西大同近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內蒙古武川縣頭號村、呼和浩特市壩口村、寧夏固原近郊的一些地方，發掘出土了許多與中亞、西亞有關的遺物，主要有東羅馬列奧一世金幣、薩珊朝卡瓦德一世，庫思老一世銀幣，懾噠或波斯風格的銀杯、舟形杯、銀碗、鑲寶石金戒指、鑲金銀盤、鑲金銀瓶、玻璃碗等數量眾多的外國製品〔註四四〕。如果將以上地點有機地聯繫起來，人們就不會忽視山西大同至寧夏固原道路的存在了，會看到一條從山西大同出發，沿著內蒙古鄂爾多斯台地邊緣，最後抵達寧夏固原的道路，其兩端為各自的中心。雖然以上發現地點如完全連結起來，尚有許多缺環，但如果結合文獻記載，就可以肯定這條道路是非常清晰的。日本學者前田正名首先從文獻上注意到了這條道路的存在〔註四五〕。

四世紀末五世紀初，久居陽山腳下的鮮卑拓跋部，開始了它的擴張生涯。首先於登國六年（三九一年）魏太祖率軍在五原的金津渡河，攻占了匈奴劉衛辰所居的悅跋城，並且大獲全勝，悅跋城（即代來城）均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境內。劉衛辰為部下所殺以後，其子赫連勃勃便投奔了遠在高平川（今寧夏固原清水河）一帶的岳父沒奕干。拓跋珪很快注意到了盤居在高平川的沒奕干、赫連勃勃。天興五年（四〇二年）便命常山王元遵等人領兵五萬餘人〔註四六〕，攻占了這一地區，沒奕干、赫連勃勃等人只率千餘人亡命秦州（今甘肅天水）。有關赫連勃勃從鄂爾多斯逃往高平的路線，史籍缺乏詳細的記載，但是這條道路的存在卻是毋庸置疑的，後來的魏軍可能也是沿著這條路追到高平川，顯示出魏軍對於交通要道不同凡響的重視，雖然這一點領是十分短暫的。魏軍要想沿著這條「絲路」全面推進，那是十分困難的，由於各種勢力交錯盤居，以後的幾十年魏軍始終沒有能有效地控制這條通路，其間赫連勃勃的勢力則不斷壯大，並建立了著名的大夏國。公元四二五年勃勃去世，不久，拓跋燾便親率大軍攻陷著名的「統萬城」，據記載，統萬城陷落以後，魏獲府庫珍寶，器物不可計數〔註四七〕。

十六國時期由於河隴地區所受到的戰爭影響不大，又居地利之便，獲得了大量的西域奇珍異寶，赫連勃勃長期盤居高平一線，統萬城中的許多域奇珍，當然也是這一時期搜括而來。統萬城淪陷以後，其殘部在赫連勃勃弟赫連昌、赫連定的統率下又回到高平一線，魏軍追蹤而來，始光四年（四二七年）九月安定（今甘肅涇川縣）軍民舉城投降，赫連昌被俘後，餘部又推赫連定為王退守平涼（今寧夏彭陽縣境內）。神龜四年（四三〇年）十二月，魏世祖率大軍親征平涼，守將社於等見大勢已去，也舉城降魏，赫連定單騎逃往上邽（甘肅天水市）。至此，高平一帶完全被控制。太延二年（四三六年）在固原又置高平鎮【註四八】，加強對該地區的保護。這樣可以看出，從固原出發，經過隴東轉道陝北，沿無定河再經鄂爾多斯台地至平城有一條暢通無阻的大道，與高平鎮同時設置的武川等著名北方六軍鎮，阻止了柔然等少數民族南侵，完全保證了這條路線的安全。然後再向高平以西發展，窺視河西走廊，先與沮渠北涼政權通好，後又伺機吞並北涼，攻占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得西域珍寶無數。通過這樣的經營，北魏與西域的聯繫也建立起來，首先是派使西域諸國，終於在太延二年（四三七年）獲得成功，董琬、高明等六批使節，攜大量財物到達西域十幾個國家。《魏書·西域傳》記載：「太延中，魏得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遣使來獻」【註四九】，其盛況空前。元魏遷都洛陽以前和西域的貿易，互使基本上就是仰仗著這條道路進行的，其中當然也包括同皮斯薩珊王朝的聯繫，以《魏書》本紀統計，元魏遷都洛陽以前波斯遣使與魏者，共有五次：

- 文成帝太安元年（四五五年）。
- 文成帝和平二年（四六一年）。
- 獻文帝天安元年（四六六年）。
- 獻文帝皇興二年（四六八年）。
- 孝文帝承明元年（四七六年）。

當然正史記錄的僅僅是正式使節，民間的各種交往那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五次朝貢有四次是在薩珊卑路斯在位期間完成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卑路斯銀幣在鑄成後短短的十幾年中迅速地傳入固原，當時的高平鎮。

敦煌莫高窟中出一件北魏刺繡，發愿文紀年為太和十一年（四八七年），其中的供養人服飾形象在同期壁畫中找不到相同的例子，但與大同云岡石窟太和時期及其以前的供養人服飾相同，與兩者完全相同的還有處於敦煌、大同之間的固原北魏漆畫中的孝子故事連環畫中的人物形；象，它們均穿夾領小袖的鮮卑人裝束，刺繡的研究者說：刺繡「它應該是從平城一帶被人帶到敦煌來的」（註五〇），從而這樣也就揭示出敦煌、高平、平城之間這類藝術品的內在傳播渠道。

元魏遷都洛陽以後，高平仍然是西域通往洛陽的一個交通要塞，甚至在大動亂的年代這種聯繫仍未停止。正光末年，高平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時嚙嚙國向元魏貢獻一頭獅子，路經高平時，為起義軍首領萬俟丑奴所扣押，並改年號為「神獸」，後來起義被元魏大軍鎮壓，這頭獅子才被送到洛陽，並在宮廷之中引起一系列十分有趣的故事（註五一）。以此看來，北朝時期，來往中原地區的西域使節基本上是通過固原這一商道要塞到達洛陽，既使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也不例外，顯示出其地不同凡響的重要性。

隋唐間首都轉移長安，當時的原州（今固原）更是長安通往西域的重要門戶。《元和郡縣圖志》涼州條：「東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蘭路一千六十里」（註五二）。其中所謂的皋蘭路，是從烏蘭縣烏蘭關渡黃河，至會州（今甘肅靖遠縣）的會寧關，經今寧夏海原縣，再到原州，經涇州（今甘肅涇川縣）邠州（今陝西彬縣）至長安。道路上置有許多驛站，在吐番占領河隴地區之前，西域通往長安的道路大都取道原州，秦州路使用較少，大約是由於路途遙遠之故。《元和郡縣圖志》中稱，取道原州的皋蘭路為「一千六十里」，實際上根據《元和郡縣圖志》新舊《唐書·地理志》提供給我們的各州之間里距推算，這一數字大約為一千六百里之誤（註五三）。

總之，從公元五世紀以後至八世紀左右，隨著中國與西域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固原在這條國際商道「絲綢之路」上的地位日趨重要，西亞、中亞的各種奢侈品也源源不斷地運來，眾多的遺物、遺跡也留在固原這個「絲綢之路」要塞上。八世紀以後，中國與西方不斷地運來，眾多的遺物、遺跡也留在固原這處「絲綢之路」要塞上。八世紀以後，中國與西方尤其是拜占廷帝國的關係，由於阿拉伯地區的興起，幾乎完全終斷，因為由於宗教信仰的緣故，東西方商人沒有可能順利地通過該地區，所以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也逐漸地少起來。

## 七、金銀幣成分的測定

爲了解東羅馬金幣、薩珊銀幣和其仿製品等金銀幣的金屬成分，我們對其進行無破壞成分分析，測試分析由北京科技大學金屬材料系在掃描電鏡中進行，由北京科技大學冶金史研究室韓汝珍教授主持。

### 1. 樣品

作爲在掃描電鏡中進行無損測試的樣品共有五個。其中二個爲隋代史射勿墓出土金環，測試結果另文描述。樣品的選擇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即我們在上文討論中所涉及的金銀幣種類約有薩珊卑路斯銀幣、東羅馬金幣的仿製品和薩珊金幣的仿製品等三種，所以選擇的樣品分別爲史射勿墓薩珊銀幣、史訶耽墓東羅馬金幣仿製品及史鐵棒墓薩珊金幣仿製品。以保證選擇的合理性。

### 2. 測試

電鏡掃描無損分析選用的機器是劍橋S-250NK3掃描電子顯微鏡LINKANI0000能譜儀，激發電壓爲20KV。在樣品的不同部位測定二至三次，然後取其平均值，分別求得三個樣品元素分析數據。列表於下：

金銀幣樣品電鏡掃描分析數據

名 稱	編 號	時 代	成 分 ( % )			備 註
			金 Au	銀 Ag	銅 Cu	
1. 薩珊金幣	86YTM2:1	唐	1	九四·六五	五·〇	〇·三六*
			2	九四·九六	四·六二	〇·四三*
			3	九四·六二	四·六〇	〇·七九
			平均	七四·七四	四·七四	〇·五
			曲線一			

一九九三年六月



- 【註一】：J.de Morgan, Manuel de Numismatique Orientale, La Perse 2, Fig. 401 P319, 1923——1936 Ravis。
- 【註二】、【註四】：馮承鈞原編陸峻嶸增訂《西域地名》增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 【註五】：Robert Gobl, Sasanian Numismatics, XV, Translated by Rauli Serinin, 1971, Klinkard & Biermann, Braunschweig。
- 【註六】：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一期。
- 【註七】：同註六。
- 【註八】：見Robert Gobl上揭書二。
- 【註九】：見朱捷元、秦波《陝西長安和耀縣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一文中夏鼐先生補充考釋，《考古》，一九七四年。
- 【註一〇】：H. Goodenr, A Handbook of the Coin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45, 1960 London。
- 【註一一】：A.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 Su and EasterIran 4Vols, Oxford 1928, London。
- 【註一二】：夏鼐《西安土門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式金幣》，《考古》一九六一年八期。
- 【註一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
- 【註一四】：同註一一。
- 【註一五】：Volker Zedelius, Alte und neue Funde von Goldmünze aus Niederachsen, Nachrichten aus Niedersachsens Urgeschichte, Band, 1977, Hildesheim Verlag August Lax。
- 【註一六】：Gerd G. Koenig, Frühbyzantinische und sassanidische Münzen in China, Geld aus China, P890—109, 1982 Bonn。
- 【註一七】：參見卜布爾努瓦《絲綢之路》耿昇中譯本，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 【註一八】：參見Robert Gobl前揭書。
- 【註一九】：參見J.de Morgan前揭書P328 Fig416。
- 【註二〇】：同註一八。
- 【註二一】：Clement Huart Ancient Persia and Iranian Civilization, P135, 1927, London。
- 【註二二】、【註二四】：參見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冊馬駁中譯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年；卡爾·布羅克爾曼《伊斯蘭教各民族與國家史》孫碩人等中譯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
- 【註二三】：李遇春《新疆烏恰縣發現金條和大批波斯銀幣》，《考古通訊》一九五九年九期。
- 【註二四】：夏鼐《中國最近發現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二期。

- 【註二五】：J. Walker, A Catalogue of the Muhammadan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 Introduction II 1956, London。
- 【註二六】：參見A. Stein前掲書。
- 【註二七】：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一九七四年二期。
- 【註二八】：小谷仲男《死者のに貨幣を含ませる習俗——漢唐墓葬における西方の要素》原刊《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十三卷一九八八年，後收入富山大學人文學部《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文化傳播と地方差の諸相》一書，一九八八年。
- 【註二九】：參見樋口隆康《テイウ・テベの遺寶》，《佛教藝術——中央アジアの佛教美術》一三七號增大號特集；梅村：《大夏黃金寶藏的發現》，《文物天地》一九九一年六期、一九九二年一期；吳焯《西伯爾罕的寶藏及其在中亞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七年四期。
- 【註三〇】：參見O.M. Dalton,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 1905, London。
- 【註三一】：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龍門安善夫婦墓》，《中原文物》一九八二年三期。
- 【註三二】：張海云、廖彩梁、張銘惠《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六年二期。
- 【註三三】：張全民、王自力《西安東郊清理的兩座唐墓》，《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二年五期。
- 【註三四】：羅丰《關於西安唐墓所出東羅馬金幣仿製品的討論》，《中國錢幣》一九九三年四期，亦刊《內蒙古金融研究·錢幣專刊》一九九四年一期，二者繁簡稍有不同。
- 【註三五】：員安志《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與咸陽飛機場出土大量隋唐珍貴文物》，《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三年六期。
- 【註三六】：夏鼐《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考古學報》一九九九年三期，後收入《考古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 【註三七】：此據《獨孤羅墓志》拓片，見夏鼐上掲文。
- 【註三八】：《隋書·食貨志》卷二十四，中華書局標點本。
- 【註三九】：桑原鷺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任した西域人に就て》《桑原鷺藏全集》第二卷，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
- 【註四〇】：夏鼐《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考古學報》一九九九年三期。
- 【註四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八三年。此條材料最先由池田溫教授在《八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一文注中指出（《エラミア文化研究》一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最近衛月望先生也注意到這條材料（參見《涼州金銀錢和沙州玉錢》《全國第二次絲綢之路貨幣研討會文集》一九九一年）
- 【註四二】：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一九七四年二期。
- 【註四三】：G. Koening 上掲文。

【註四四】：參見羅丰《固原北魏漆棺畫に見えるベルシヤの風格》，《古代文化》第四十四卷八號，平成四年八月。

【註四五】：參見前田正名《北魏平城時代の鄂爾多斯沙漠南緣路》，《東洋史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一號，胡戟譯文載《西北歷史貨資料》一九八〇年三期，八十一年一期。

【註四六】：《魏書·太祖紀》卷二，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註四七】：《魏書·太祖紀》卷四。

【註四八】：《魏書·地形志》卷一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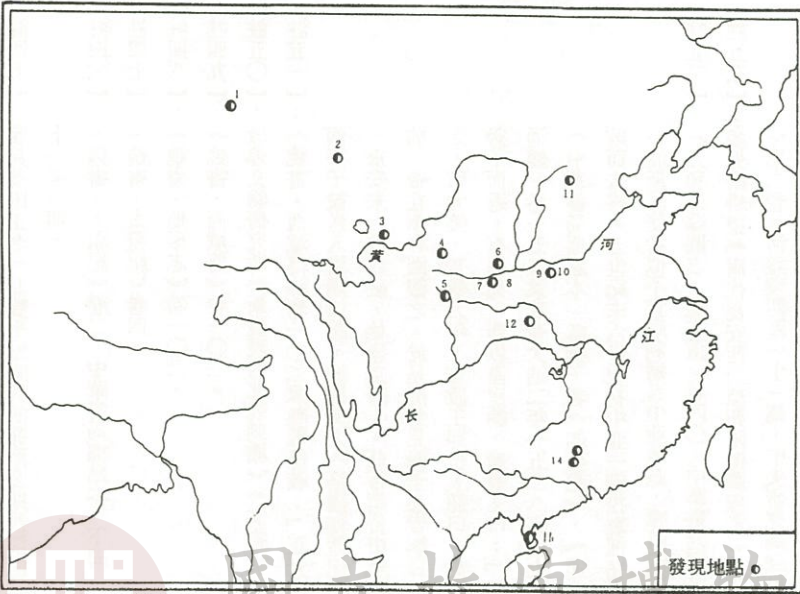
【註四九】：《魏書·西域傳》卷一〇二。

【註五〇】：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現的北魏刺繡》《文物》一九七二年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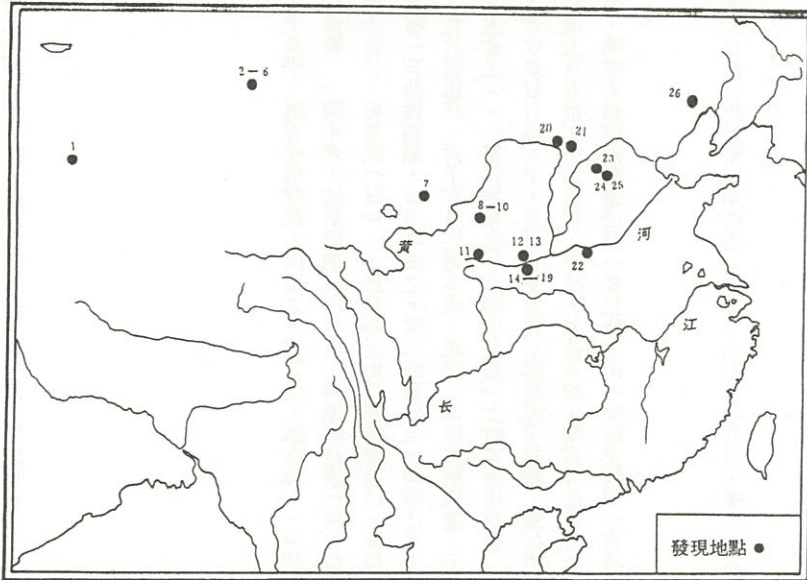
【註五一】：《魏書·西域傳》卷一〇二《嚙噠國條載》：「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個獅子被送入洛陽以後，據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城南》卷三獅子坊條載：「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萬俟（俟）醜奴所獲，留於冠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誠（試）」。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達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范祥雅校注《洛陽伽藍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資治通鑑》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五二八年）七月條亦載：「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中華書局標點本）獻獅子者《伽藍記》、《通鑑》俱稱波斯國，實際上自五世紀中葉以後，嚙噠人與波斯國之間多有戰爭發生，最後以薩珊人戰敗而告終，五世紀末六世紀初中亞一帶控制權完全掌握在嚙噠人手中，嚙噠人與中國聯絡密切（參見余太山《嚙噠史研究》齊魯書社，一九八六年）波斯國使者似不宜順利通過中亞地區，嚙噠國獻獅一說似屬可信。

【註五二】：《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卷四〇，中華書局標點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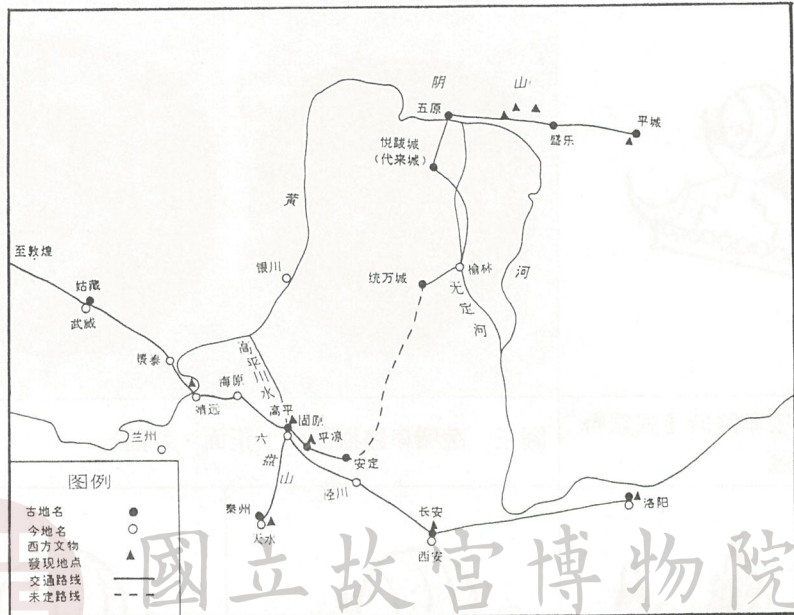
【註五三】：參見嚴耕望《唐代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一期，一九七一年九月，後收入其著《唐代交通圖考》第二卷《河隴嶺西區》十一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八十三，一九八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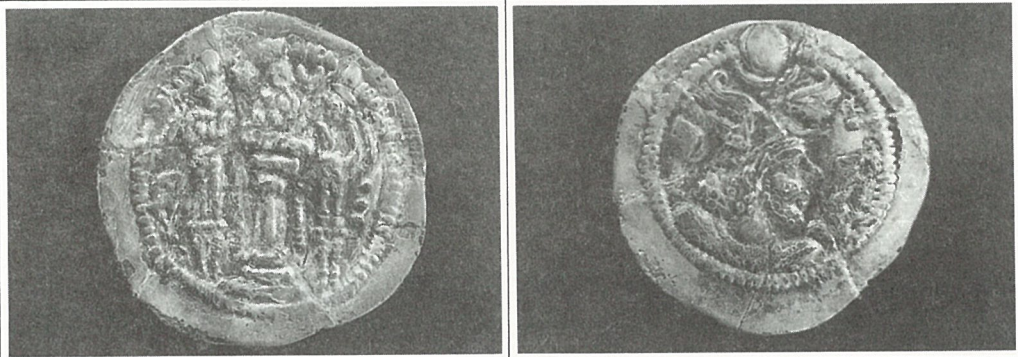
地圖一 波斯薩珊卑路斯銀幣中國發現地點圖  
1.吐魯番 2.張掖 3.西寧 4.固原 5.天水 6.耀縣 7.8.西安 9.10.洛陽 11.定縣 12.安陸 13.曲江 14.英德 15.燧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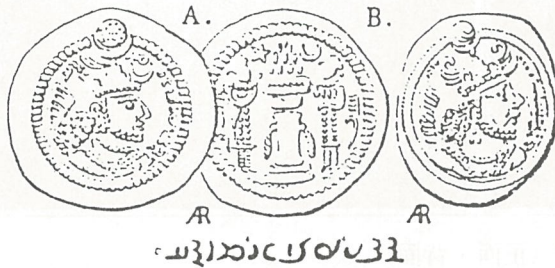
地圖二 東羅馬金幣及其仿製品中國發現地點圖  
1.和田 2.3.4.5.6.吐魯番 7.武威 8.9.10.固原 11.天水 12.13.咸陽 14.15.16.17.18.19.西安 20.土默左旗 21.武川 22.洛陽 23.贊皇 24.25.磁縣 26.朝陽



地圖三 北朝時期平城、高平、姑藏一線交通圖



圖一 北魏墓 薩珊卑路斯銀幣 (正面·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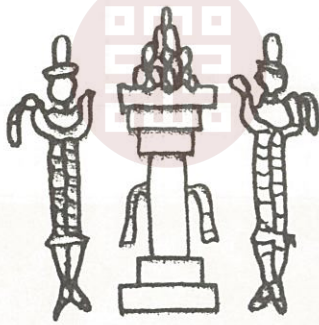




圖四 薩珊卑路斯 I 式銀幣  
王冠



圖三 薩珊卑路斯銀幣 (正面·背面)



圖七 薩珊卑路斯 III 式銀幣  
王冠



圖六 薩珊卑路斯 III 式銀幣  
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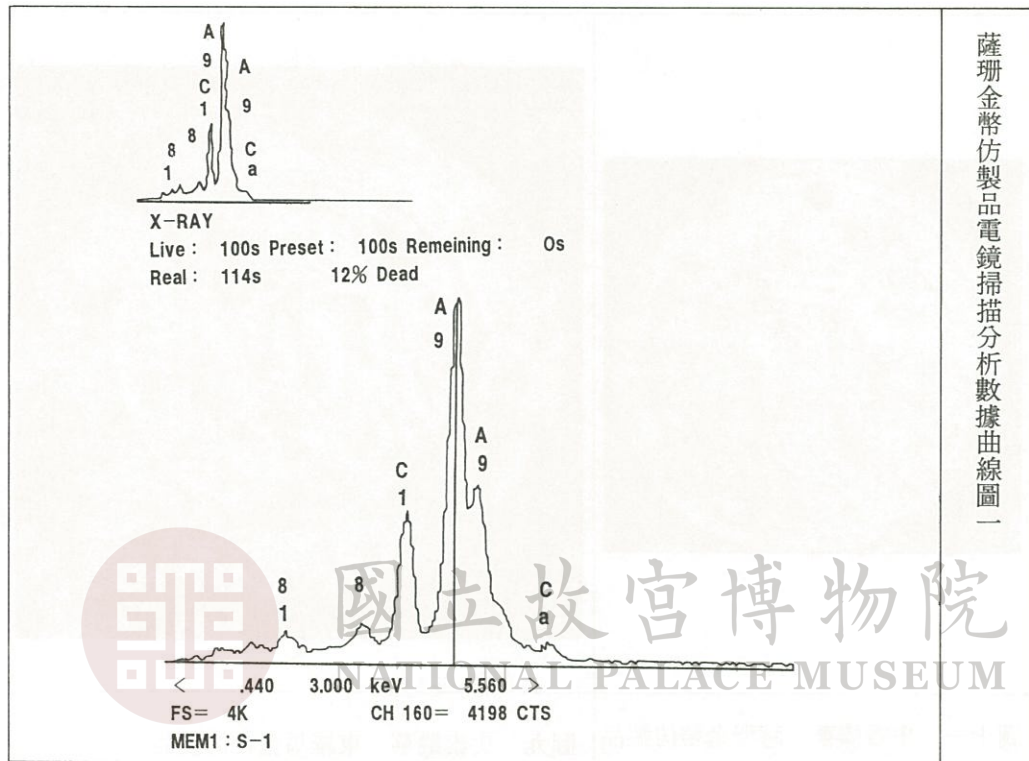


圖五 薩珊卑路斯 II 式銀幣  
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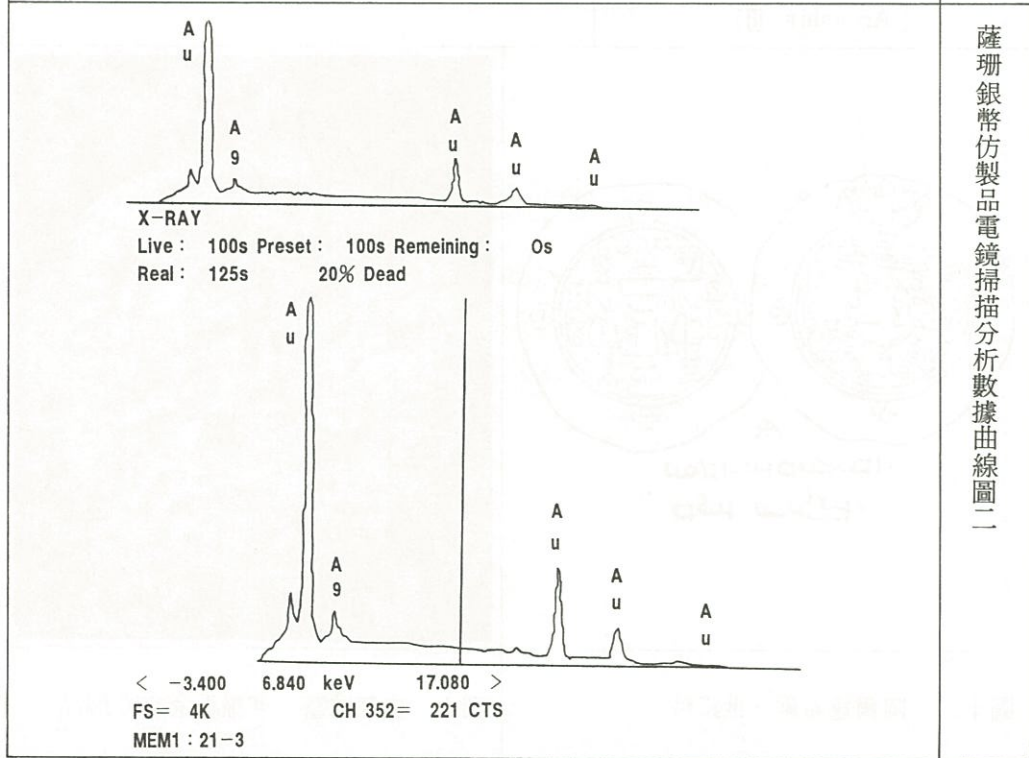


圖八 史道德墓 東羅馬金幣仿製幣 (正面·背面)





薩珊金幣仿製品電鏡掃描分析數據曲線圖一



薩珊銀幣仿製品電鏡掃描分析數據曲線圖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 Study of Foreign Gold and Silver Currency Uncovered in Ning-hsia

Luo Feng

Ku-yüan Museum

## Abstract

From 1982 to 1987 archaeologists have uncovered five foreign coins in the Sui-T'ang period (581-907) tombs in Ku-yüan, Ning-hsia. One silver coin is from the Peroz empire, another gold coin from Ardashir III, and the remaining three from Eastern Roman Empire. This study aims to describe the discovery, testing, and analysis of these coins and to conduct a broad discussion of the foreign coins discovered in Ku-yüan that have clear markings. I hope that such a study will enable u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oles of the Silk Road running through Yuan-chou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ui-t'ang periods.

Keywords: Gold and Silver Currency 金銀幣

Ning-hsia 寧夏

Ku-yüan 固原

Sui-T'ang periods 隋唐時期

Northern dynasties 北朝

---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Antonio C. Tavares.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三三 through 六六。